

文人结社与清末民国旧体诗的现代上海书写

袁志成

(湖南城市学院人文学院, 湖南益阳, 413000)

摘要: 上海作为清末民国最为著名的国际化大都市, 汇聚了多种文化形态, 吸引了大批旧式文人, 报刊为文人的雅集唱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自由吟咏、自由表达的意识以及文人社团自觉的传播意识得到了充分体现, 上海作为文学创作的专门题材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文人社团通过描写新事物、新风气, 凸显上海的文明、时尚和摩登, 并借助对上海本地历史遗迹、具体物象的吟咏, 勾勒其兼容并包的形象。同时, 他们也对上海的阴暗面进行了审视和反思。他们笔下的上海既是新奇的、物欲的、诱惑的, 又是古老的、超然的、怡乐的, 折射出现代人行行为的矛盾性和精神的困惑, 触及了“现代化”背景下生存、生活的时代命题。

关键词: 上海; 清末民国; 文人结社; 现代书写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2)03-0208-09

晚清以降, 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已经无法置身于世界文明体系之外, 睁眼看世界日益成为开明知识分子的共识。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发生, 直接把学习西方思想文化推向了高潮, 知识界有了新旧之别。在中西文化、新旧文化冲突和交汇的过程中, 上海作为我国近现代最为著名的国际化大都市, 汇聚了多种文化形态, 吸引了不同的文人群体尤其是旧式文人群体。“身处大变革时代, 学者到底该如何思考、表述与立说?”^{[1](10)}这些尊崇传统文化、恪守传统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会以怎样的心态面对现代文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 他们又是如何看待上海, 并用文学作品来摹画? 这些问题不仅涉及中国近现代文人结社的创作取向, 也关系到中国近现代文化心理的嬗变。

一、近代报刊与上海旧式文人结社的现代意识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中英签订《南京条约》,

上海于 1843 年成为通商口岸, 是中国最早接受外来文化的地区之一。更为重要的是, 这个此前为人所忽略的一隅之地逐渐吸纳了越来越多的来自国内其他地域的民众, 表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诉求。诚如陈思和所言: “移民带着本乡本土的地域文化来到上海, 经过不同的工作实践, 一边不断吸收来自西方的先进文化, 一边不断提升自身的主体文化, 集体把上海打造成一个海纳百川、中西交流、融汇各地文化优势、勇于开拓创新、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充满活力的文化场域。”^{[2](14-23)}

正因为上海是“海纳百川”“中西交流”的文化场域, 所以在清末民初政权更迭之际, 这里成了旧式文人的避风港。胡思敬《吴中访旧记》中说: “予既在沪, 则从陈考功伯严访故人居址, 伯严一一为予述之曰: ‘梁按察节庵、秦学使右衡、左兵备易卿、麦孝廉蜕庵, 皆至自广州。李藩司梅庵、樊藩司云门、吴学使康伯、杨太守子勤, 皆至自江宁。赵侍郎尧生、陈侍御仁先、吴学使子修, 皆至自北京。朱古微侍郎, 新自苏州

收稿日期: 2021-08-31; 修回日期: 2022-01-04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金“近代文人结社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研究”(19JL04); 湖南省社科基金“抗日时期旧体诗价值构成研究”(18YBQ016)

作者简介: 袁志成, 男, 湖南邵阳人, 文学博士, 湖南城市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近现代文学, 联系邮箱: 282465902@qq.com

至。陈叔伊部郎，新自福州至。郑苏庵藩司、李孟符部郎、沈子培巡抚，皆旧寓于此。’又曰：‘苏庵居海藏楼，避不见客。节庵为粤人所忌，谋欲杀之，狼狈走免，身无一钱，僦小屋以居。子培伪称足疾，已数月不下楼矣。’”^{[3](216)}梁鼎芬、麦孟华、李瑞清、樊增祥、吴璆、朱祖谋、陈衍等文化名人纷纷寄居沪上，故陈三立说：“当国变，上海号外裔所庇地，健儿游士群聚祸语，睥睨指画，造端流毒倚为渊蔽。而四方士大夫雅儒故老，亦往往寄命其间，喘息定，类摭其忧悲愤怨托诸歌诗，或稍缘以为名，市矜宠。”^{[4](986)}

自由宽松的文化环境和多元畅通的传播交流渠道，极大地促进了清末民初上海的文人结社，上海陆续出现了城南文社、龙门词社、神交社、丽泽吟社、南社、春晖社、爱吾诗社、小说社、蛻尘吟社、希社、超社、东社、花近楼逸社、春音词社、消寒诗社、小罗浮社、丽泽文社、松风诗社、鸥社、白莲社、沧社、甲子吟社、罗溪吟社、沅社、聊社、因社、声社、春江诗社、午社、萍社等文人社团，囊括了朱祖谋、樊增祥、吴庆坻、缪荃孙、沈曾植、梁鼎芬、沈瑜庆等著名文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人社团与报纸杂志形成日趋密切的关系。如丽则吟社就依托《国魂报》，南社则把《太平洋报》当作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鸣社的作品则刊载于《鸣社杂志》《大世界》《金刚钻》《小说月报》等。陆冠秋等于民国十三年(1924)组织的甲子吟社，参与者有许泰、王泰等人，主要以《申报》《金钢钻》为阵地。另外，东社则有社刊《东社》，体例仿《南社丛刻》，分文选、诗选、词选3部分。其编辑人员主要是东社成员(如郭绍虞、吴冰心、金天翮、曾泣花、周影竹、黄松庵)，可见文人社团是自觉地利用刊物来传播作品、宣传主张的。

事实上，上海早在19世纪后期就凭借报刊深刻地影响着文人的精神面貌和文学创作。如上海《申报》直接促成聚星吟社的发展，该社社长蒋其章是《申报》的主编，他的诗作就常刊于《申报》。如1872年12月25日，《申报》登载了蒋其章的《壬申长至日同人作消寒雅集于怡红馆，漫成二律，用索和章》。该作品不仅通过《申报》向外界传递了聚星吟社首次雅集的信息，也表示

了置身通都大邑以诗词为乐、广结海内名流的思想理念和文学雅趣。1875年1月15日，《申报》所载蔡尔康《初九订为消寒之宴》云：“征诗如征兵，邮筒忽星火。屡约消寒会，迁延终不果。骚坛诸巨手，毋乃太慵惰。因念聚星社，创始非自我。元卿诗无敌，刚健合婀娜。”^{[5](311)}该诗从细节上描述了聚星吟社雅集唱和的频繁程度和一呼百应的感召力。正如聚星吟社一些作品所描述的那样，“海滨雅集订心知，酣战骚坛力不支”“从此海滨添韵事，却叫吴下播新闻”^{[5](278-282)}。此后，《申报》不断刊登沪上文人结社的信息，适时进行宣传。如1877年，《申报》第1682号所载《诗社纪盛》云：“沪渎为通商繁盛之区，而风雅一途亦尚不阒寂，前者诸同人聚星吟社之设，一时文人才士相与唱和，海内艳称。”^[6]《申报》的这些报道对该社造声势、扩影响、树形象、扬美名发挥了重要作用。又如1888年，《申报》第5359号登载玉兰吟社的情况，其主要社员有王韬、黄式权、何桂笙、蔡尔康和钱昕伯等，诗社“月凡两举，沪江为文人才士所萃，能诗者辈出”^[7]。这里就清楚地交代了雅集结社的缘由、频次及以文会友的初衷。

这些诗坛动态的刊载情况说明了新形势下的三点诗歌动向：一是以报纸为代表的近代传媒广泛登载了文人社团的作品；二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文人社团具有自觉的传播意识；三是报纸作为文明大都市上海的一个侧影，象征着开放、包容，能够为“风雅好事”的诸位先生提供发声和演出的舞台。因而，有学者指出：“《申报》创立初期，主笔蘅梦庵主以报纸为平台，聚集寓沪文士成立聚星吟社。在报纸的参与下，吟社社集方式更灵活、自由和开放，表现出诸多创新特色。聚星吟社有意凸显上海文人的群体意识，塑造上海的文坛观念，某种程度上可视为现代文学社团的萌芽。社集诗作具有鲜明的上海都市背景，表达了上海文人的自身体认，标志着一种新的写作风向。”^[8]这种都市背景下的自身体认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过程，是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激烈碰撞的过程，“正是由于这样的撞击，中国人才得以以新的眼光观照西方他者，并凭借西方他者‘镜子’，回头重新观照自我”^{[9](7)}，重

新确认和思考中国及中华文明在世界舞台的位置。

在近代传媒的影响下,上海旧式文人结社改变了以往面对面相互切磋的诗词创作形式,转而借助报纸杂志,在不同文学场域展开遥隔天涯式的唱酬应和。这是一种新型的文人联络网,以思想、诗歌交流为基础,以报刊为载体,打破了以科考同年、书院同门、地域同乡“三同”的关系网络,形成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其现代意识越来越清晰。诚如有的学者所说:“雅集是一个传统,中国文人借此以文会友,是朋友、熟人或师生之间的诗歌吟诵、酬唱和评鉴活动。当这样的‘传统’与现代报纸发生对接,并通过版面运作出现时,原有的传统就发生了变化。诚如霍布斯鲍姆所言,成为一种‘被发明的传统’,是为回应新形势而采取参照旧形势的一种方式。”^[10]这也就意味着传统文人社团最早从报纸杂志等现代传媒那里获得了扭转创作和传播格局的助力,因而得以实现精神的调适和共鸣,并在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立足沪上。

可以说,上海为文人结社提供了充分的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文人社团自觉地将沪上雅集和吟咏唱和作为表现理想人生境界和生命形态的重要手段,上海也就顺理成章地作为文学创作的专门题材和视角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被纳入自由、开放、文明的视域中进行审视。

二、文人社团的旧体诗与现代上海的多维书写

近代以来,上海在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得到快速发展,美国学者白鲁恂认为:“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11]这为当时的文化人“提供了较多新的工作机会”,“稍有一技之长的文人在这都能立脚”^[12](61)]。比如,希社社长邹弢刊于《希社丛编》的鬻文广告“酒勺卖骈文诗词润例”曰:“碑铭诔赞寿文婚辞序言,每百字二十元;短体题跋,以三百字为限,五十元;诗长古,二十元;律诗每首十元;绝诗每首五元;词长调十四元,中调十元,小令

五元;楹联长言十元,余四元。”^[13](102)]尽管诗文可以换钱,解决生计,但并不是所有作者的诗文书画都能尽如人意。俞剑华就对上海文人的生活有过一番描述:“近几年来,社会经济之衰弱,农业经济之破产,朝为富商,夕变乞丐,救死扶伤,节衣缩食之不暇,尚有何清兴以注意于毫无实用之艺术乎?衣食足而复知礼仪,经济允而后购书画。故今日首先受不景气之影响者,厥为书画家和古董商人,而所谓专门画家者,乃遂问津无人,求售无方,日坐愁城,对笔长叹,颇欲弦改另张,而习惯以成,体力已惫,莫之能挽矣。”^[14](60)]正是因为诗文与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上海的文人社团作为身处这个独特文化场域的群体才能够体会时移世易中城市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嬗变,敏锐地捕捉到此地光怪陆离的社会现状与日常生活的细节。

上海作为屹立于东方的国际大都市,在文人社团的旧体诗中得到了全面细致的呈现。从早期来看,文人社团的诗歌作品较为关注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新奇的“舶来品”,如聚星吟社社友燕春侍史、葛其龙对涌入上海的赛马比赛有描写,如《小春十三日观西人赛马》《西人赛马歌》等。袁祖志云:“春秋佳日趁晴明,跑马场开纵辔行。胜负事何关局外,也将金币赌输赢。”^[15](18)]诗人赌马却不计较胜负得失,表征了人们对西方新鲜事物的热情和趣味,折射出时人对“摩登”“时尚”的追捧。颐安主人则描绘了象征基督教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教堂,诗云:“教堂高立笔尖峰,屋宇红墙砌万重。四壁广围青草地,每逢礼拜听撞钟。”^[15](118)]教堂作为西式建筑的典型代表,高大宏伟,显示着宗教的权威和肃穆,与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迥异。这与玉兰吟社成员王韬早年初次登临沪上时给读者描述的一幅幅奇图异景有相似之处:“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16](58)]

日本学人古城贞吉于晚清时期寓居上海,与汪康年、梁启超等一起创办《时务报》,同时研究中国文学,并于1897年出版了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五千年文学史》。该书以学科概念第一次完整地撰写中国文学史,具有现代性视

野，亦关注思考中华文明。寓居上海的著名文人文廷式初次接触到该书时颇感新奇，认为该书完全有别于中国传统的零碎的文学史料，并赋诗云：“沧海横流剩此身，头衔私喜署天民。岂知零落栖迟地，锦遇嶙峋磊砢人。定论文章千古在，放怀世界一花新。停云自此长相忆，何处桃源欲问秦。”^{[17](326)}“定论文章千古在”代表了沪上文人对现代学术著作时的新奇感受，说明了寓居上海大都市的文人率先接受以现代物质为基础的现代文明，并以诗歌等传统文学形式抒发自己的现代性体验。

随着现代上海物质文明水平的快速提高，电话、电灯、电影、电扇逐渐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郭嵩焘称：“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18](189)}郭氏此言虽只涉及钟表玩具、呢绒洋布，实际表明了西方文明在清末民国时期的全面渗透，也自然给中国文人带来新器物的现代性新体验，故文人社团的诗词创作对这些象征现代文明的物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春江诗社社员就在社集活动时专门以电扇、电影等为吟咏对象。经适厂《电扇》云：“炎天日铄金，元阳盛伏庚。酷暑无地避，挥汗觉劳形。忽如秋风来，暑退心安宁。电转流光速，声挟风雷鸣。恍若捶金鼓，共炎暑鏖兵。中怀如饮冰，小坐神亦澄。嗟尔趋炎客，于今心可清。”^{[19](330)}人们在酷热的夏天，往往挥汗如雨，劳形伤神，只能被动地承受，但电扇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处境，不竭的凉风，使人心神安宁，倍感快意。经适厂、孟磐谷还有社课诗作《电影》：“惟妙诚惟肖，迷离入目频。风光何旖旎，景物得清新。似幻原非幻，疑真又不真。天公归造化，奇术巧通神。”^{[19](334)}诗歌没有就具体的电影情节和电影内容展开描述，多从最初的感受出发描绘电影给传统知识分子带来的惟妙惟肖、真真假假的深刻印象。

松风诗社社员也喜观影，并对电影中的人物有精彩的刻画。1940年，电影《魂断蓝桥》热映，松风诗社社员以社课题咏电影《魂断蓝桥》中的费雯丽出演的女主角玛拉，社员张琢成、唐彦、雷补同等三人同题吟咏。张琢成诗云：“盈盈一水泛秋波，溢出蓝桥艳若河。自昔魂消临去转，

而今愁煞盼来多。含腔直欲欺青黛，凝睇也能失翠螺。喜怒相看终不变，永无加白向人诿。”^{[20](428)}西方女子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碧绿的眼睛，因此诗人聚焦女主角的眼睛，写出了女主角玛拉的万种风情。松风诗社社员雷补同亦有诗吟咏女主角眼睛的诗作，以示其“醉态朦胧”“媚眼横波”。社员唐彦则以女主角的细腰为吟咏对象，云：“艳说西方彼美娇，漫夸太傅小蛮腰。临风一颦神移处，宛似纤纤舞柳条。”^{[20](428)}表面上看，这些作品议论的不过是电影中的角色或者是荧幕上呈现的女性形象，本质上却隐含着中国传统文人对西方女子所指代的西方文化的“笑纳”，他们不仅不抗拒西方爱情故事所宣扬的价值观念，而且津津乐道女主人公的形象，并试图加以欣赏、理解和接纳。所以，李欧梵指出，“所谓物质文化就是物质文明，也就是‘声光化电’的影响，一开始我没有想到商品，在研究的过程中，才逐渐意识到上海人对现代意识的接受，并不是先从思想上开始的”，“日常生活的现代性不是先从思想上，而是先从物质生活方面接受的”^{[21](10)}。

上海的文人社团不排斥新事物，在发掘“洋玩意”的同时，也热衷吟咏上海的“地标”和当地的传统小吃。如淞滨吟社专门设置《展重阳分咏上海古迹》的社课，分咏静安寺之应天泉、龙华塔、沪渎垒、最闲园、露香园、玉泓馆等，挖掘并展现上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表达文人内心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如社员沈焜《应天泉》谓：“行行静安寺，泉品号第六。湛然玉一泓，涌出珠万斛。洗不尽豪华，悲哉沪江俗。”^{[22](489)}往事如烟，浮尘荡尽，唯有这被誉为“天下第六泉”的应天泉始终如一，涓涓流淌，清澈如玉。其《龙华塔》又云：“龙华忆胜游，十里桃花送。佛塔高崔嵬，古迹谈前宋。铃语一声声，唤醒繁华梦。”^{[22](487)}太平兴国二年(977)，吴越王修造的龙华塔见证了世事的变迁，静静地矗立着，俯视人间的悲欢离合，将诗人的幽思引向过往。小罗浮社社集第二集分咏食品，如水豆腐、糟笋干、辣椒酱、雪蕻蕻、煨山芋、炒米花、酒脚饼、摊面衣等，皆属传统食品。这些带有中国本土色彩的物象与文人社团笔下的“舶来品”共同刻画了上海的不同侧影，共同勾勒了兼容并包的上海

形象。

作为身历政权更迭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也对上海这个新世界中存在的黑暗和丑恶更为敏感，所以许多诗歌聚焦社会现实，针砭时弊。希社社友唐鉴敏就认为，当时某些人以号称民主共和来达到一己之私欲，社会公平实在遥不可及。其《共和新竹枝词》云：“蝸蟾羹沸背文明，烽火弥天一味争”；“皮鞋短镜学西装，日本初回意气狂，新买文凭称学士，居然眼界傲侯王”；“地利兵权太自由，眈眈虎视镇神州。中央令甲犹抛弃，五族何能一统收”^{[13](174)}。在上海，叫嚣“公平”“正义”的恰恰是背信弃义者，留洋归来西装革履的“饱学之士”不过是弄虚作假之徒，上海虽然号称文明都市却又充斥着各方势力，危机四伏。这些诗歌充满了浓厚的讽刺意味，与刘豁公《上海竹枝词》描述“绅商之豪举、士女之情伪、人情之奇特、世态之炎凉、狮子林之壁垒”^{[23](13)}有异曲同工之妙。松风诗社张世昌的《咄咄歌》直指上海的不良之风，打着文明的旗号倒行逆施，政治上的野心家和投机者占居高位，而真正的贤明之士却遭受排挤。更为讽刺的是，倡导一夫一妻的立法者，却左拥右抱，妻妾成群。这里所描绘的是近现代社会转型中上海的一幕幕闹剧和丑剧。

上海这座令人魂牵梦萦的文明之都在诗人的笔下现出了多副面孔，既有文化的包容与积淀，又有物欲的诱惑和美丽的幻象。不难看出，上海在文人社团的诗词作品中既被作为积聚现代文明的典范来标榜，也被作为包藏腐朽与罪恶的渊薮进行审视。这样的叙述方式说明传统文人对上海的认识是理性的和辩证的，他们不仅注意到时代演进中上海文化的多元倾向，也看到了上海所承继的古老中国的落后因子。同时，文人结社的现代上海书写与梁启超《夏威夷游记》中所提的新意境、新词语入诗的“诗界革命”主张相呼应，是梁黄“诗界革命”理论的实践，将黄遵宪心中之诗再次变成了现实，即“吾身之所遇、吾目之所见、吾耳之所闻，吾愿笔于诗”^{[24](3)}，“其述事，以官书会典方言俗谚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举吾耳目所新历者，皆笔而书之”^{[25](485)}，他们是运用诗界革命理论书写现代

上海的践行者。

三、旧式文人结社书写“现代上海”的文人心态

文人心态是指文人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中所呈现出的有关政治、文化、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心理倾向、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左东岭称：“文人心态研究相比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又有其自身的特殊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人的心灵世界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对象，这意味着即使我们使用的文献是真切无误的，我们的态度是求真务实的，是否就真的能够真实地揭示古代文人的心态。”^[26]清末民国旧式文人结社创作的旧体诗在书写“现代上海”时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文人心态，有初次面对现代文明的压抑与苦闷，有现代都市中的闲适与避世，有体验现代文明时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还有逐渐适应新旧文化、中外文化冲突后的接受。

中国古代文人历来有隐逸的传统，而一般的隐逸者常以山林、荒村为寄居之所。正如蒋寅所言：“在通常的意义上，隐逸就是逃世，逃避官场，逃避社会生活，躲避到一个相对封闭的个人生活空间里，因此隐逸也可以同无为划等号。历史上的隐者都是这样被理解的，隐逸=无为。”^{[27](185)}但这些旧式文人却选择寓居沪上，没有回避繁华热闹的十里洋场，这意味着他们其实认识到世界之变化、时势之发展、文化之嬗变是不可避免的，传统隐逸之路已然不通，寄身都市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会并无损于其志趣与心性之护持。他们反倒因之更坚定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尽管这种理想信念在口岸文人遇到现代文明以后其焦虑压抑亦没有改变。

王韬于1846年随父王昌桂来沪，随后进入墨海书馆，真正开始接触西学，并与李善兰、张福喜、蒋敦复、郭友松、孙笠舫等相唱和。该时期王韬的诗歌是上海开埠之初中西学碰撞下传统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写照。如《四月六日集沈氏假鹤山房同人李壬叔蒋剑人孙笠舫分韵得酒字》云：

吾与休文交，曾不二年久。

落落眼中人，沪城大如斗。
千愁不出门，行乐复何有。
消闲一卷书，排闷百壶酒。
今春忽已过，笋老不适口。
乱红拥万花，浓绿围众柳。
时光满眼非，招隐共良友。
蒋诩天下士，李颀世无偶。
韬也虽不才，未敢居人后。
今日集此堂，小饮辄及酉。
酒酣愁更来，岂曰扫愁帚。
方今寇氛恶，骚扰遍淮右。
六代好江山，竟作豺虎藪。
我辈徒经生，谁能展一手。
毋笑孙樵痴，常思归陇亩。
市上问荆高，吾其为屠狗。^{[28](58)}

“沪城大如斗”真实说明了王韬离开家乡小山村到达上海之后对上海大都市的第一印象，也反映了饱读诗书的王韬内心不自觉的自卑。王韬等这一批背井离乡的文人离开了原有的文化土壤，经受一种全新的中西文化碰撞，在浩大的大上海中个人显得如此渺小，在体验现代文明时内心是如此压抑与苦闷。正如陈玉兰《王韬诗集·前言》称：“被剥离了原本固有的文化土壤的口岸文人，总有一种仰息于非我族类的夷人而在人格、经济、文化上都不能与人对等的压抑感，心灵的孤独、精神的寂寞，令他们三五结聚，互相体贴、彼此取暖。”^{[28](14)}王韬在不断地接触西方现代文明之后，逐渐进行心态自我调适。

经过一段时间的压抑与苦闷之后，沪上文人社集时开始倾向于描写闲适之情、避世之乐，凸显隐逸的态度，展示其在历史巨变中的自我调适。陈三立、沈曾植、瞿鸿禨、樊增祥等人在上海樊园组织超社以抒闲适之情。樊增祥《超然吟社第一集致同人启》对诗社成立的缘由做了细致描述：“吾属海上寓公，殷墟黎老，因蹉跎而得寿，求自在以偷闲，本乏出人头地之思，而惟废我啸歌是惧。此超然吟社所由立也。”^{[29](1982)}“求自在以偷闲”表明了上海超社成员的闲适心态，“惟废我啸歌是惧”则诠释了上海文人继承文化传统的可贵的责任感。陈三立《展花朝超社第一集樊园看杏花限东韵》云：

探梅人日樊园东，健步群随湘绮翁。尔时嫩春未破蕾，丑枝一二寻小红。流光幻转更节候，琼玉碎委蔓草丛。幸获杏花续梅后，照烛林屋光熊熊……翁还故山惜未见，乐事应念联群公。果然超社起凡例，奔集兼无雨与风。百绕芳菲袭怀抱，指画睥睨情何穷？忆昔赁居冶城侧，园杏五六哦赏同。会遭盛涨根烂死，十年梦想摇晴空。孰意乱离匿海滫，重叠花事揩双瞳。奸凶相斫日大索，天假隙地哀疲癯。耆贤况腹草木疏，各倚彩笔追化工。主人吟对益飞动，一花一句犹难终。我虱其间恶形秽，去浇酒碗称暗聋。^{[30](355)}

这位身历家国危难与时世黑暗的文坛巨擘面对樊园盛开的杏花，不只有“流光幻转”之无可奈何，也意识到在“乱离匿海滫”的处境下，“耆贤”吟诗作乐、各骋才华未尝不是一种惬意的选择。社中另一位诗人瞿鸿禨的《癸丑三月三日樊园社集用杜诗丽人行韵》写道：“人生到处皆迷津，醒狂不待酒数巡。园林百卉足明媚，斑锦照地铺茸茵。晋代衣冠委蔓草，楚客词赋伴褰芳。紫桑兀傲自心远，快饮不负头上巾。游山长作谢康乐，荷锺何必刘伯伦。眼前烟景去可惜，掷负佳日防花嗔。”^{[31](78)}他认为“人生到处皆迷津”，精神的困惑与困顿也就在所难免，而对个人来说，要紧的是不辜负眼前明媚的春光与烟景。

又如小罗浮社钱衡同《六十自述》云：“世变风云多，谁非复谁是。不管秋月明，我醉欲眠矣。”^{[32](182)}他认为与其纠缠恩怨是非，蹉跎岁月，不如独立高蹈，酒醉入眠。王鼎梅《三叠前韵赠诸同社》谓：“放浪形骸旁礴裸，流连诗酒笑言欢。此间只许谈风月，我辈何尝怨暑寒。”^{[32](31)}诗人向往的是超脱于世，放浪形骸。杨钟羲《淞滨吟社集序》对文人与沪上的关系有这样的描述：“歇浦一隅，为游子盛商之所道，无山水可观、园林之胜，骚人墨客过而不留。向非海内风尘，中原板荡，吾与诸君子安得搏沙不散，如今日之多且久哉。避地来此，将成土断，情好既洽，觞咏遂兴。”^{[22](367)}上海原本是“无山水可观、园林之胜，骚人墨客过而不留”的地方，但时势、世事迫使人们集聚此地，反倒促成了诗坛的风云际会，所谓“情好既洽，觞咏遂兴”。也正因如

此,诗人们才不拘囿于所处何世、所处何地,试图找寻超脱世俗的生命形态。文人社团的人生追求和人格精神在上海大都会这个名利场的烘托下,显得独立而可敬、可贵而崇高。

除了表现身处沪上的闲适与调适,文人社团也将目光投向文化省思。他们对上海新事物的记述,常常折射出他们对中西文化、古今文化碰撞中的焦虑。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眷恋和皈依。易顺鼎在上海专门作诗吟咏自鸣钟,所谓“制出西人异鲸吼,产从中土压鸱蹲”“盗取汉仪铜漏巧,避称宋讳玉延佳”。他看到自鸣钟自动发声,不禁感叹西方工匠的机巧,但很快又笔锋一转,认为西方的这些技艺不过是效仿中国古代的计时工具铜漏,流露出对西方文明的抵触及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维护。即使受西方文明熏陶过的王韬亦对西方器物持否定态度:“钟表测时,固精于铜壶沙漏诸法,然一器之精者,几费至百余金,贫者力不能购,玩物丧志,安事此为。其他奇技淫巧,概为无用之物,曾何足重。故韬谓此数者,即中国不行,亦不足为病。”^{[33](28)}对于身处沪上文人的这种心态,西方学者莱特的观察或许可以借鉴:“由于中国是在相对的孤立状态之中,中国在技术、制度、语言和观念上都发展出一种高度的自我满足感。在悠久的岁月里,受过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萃不知世上尚有在任何方面足以与他们自己的文明相颉颃的其他‘文明’。”^[26]因此,沪上文人一旦接触了西方现代文明,在适应接受过程中表现出抵触情绪也是正常的。

当然,上海的文人社团并非食古不化,午社等社团成员就尝试接纳新鲜事物,经常光顾电影院和咖啡馆。如夏承焘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就多次记载观影的生活片段:“1941年6月12日,午后徐著新夫妇来,邀往大华看《乱世佳人》影片,三等座三元六角,看四小时方完。全片精力弥满,场面浩大,叹观止矣。然动人力量,似犹不及《蝴蝶夫人》《绝代艳后》。1941年8月1日,午后文贯之邀往金门看《魂断蓝桥》影片,座中女子有饮泣者。1941年9月20日,往西海看《翠堤春晚》,甚好,比《桃花恨》更好。此片沪上人不厌看六七次者。佩秋来不值。”^{[34](335)}这也

从一个侧面说明传统文人正慢慢融入上海的“摩登生活”,观影成为传统文人体验现代性生活的一部分。陈旭麓指出:“正是西方的商品改变着中国社会的面貌。它没有大炮那么可怕,但比大炮更有力量,它不像思想那么感染人心,但却比思想更广泛地走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去。当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之后,它同时成了人们生活的一个部分了,旧与新,中与西,于是乎难分难舍。”^{[35](218)}电影正是如此,“润物细无声”地走进了传统文人的日常生活,沪上文人一边体验现代文明,一边坚守着传统文化。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渐渐接纳新事物,缓和对新文学的敌对情绪,并尝试碰触新文化”^[36]。上海的旧式文人和文人社团不仅在文化态度上愈加豁达,就是在社会生活上亦与时俱进、与世相谐。这样的结果表明,上海作为近现代国际大都会对文化有融汇调和之魔力,而身处其中的文人和文人社团的焦虑与纾解、疑惧与调适,正是中西文化、古今文化博弈的必然结果。

四、结语

清末民国上海聚集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在坚守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座现代大都市中时尚与风气的冲击。他们以旧体诗词来描述上海对其心灵的震撼,其笔下的上海既有光彩照人的一面,也有灰黑阴暗的一面。这深刻地反映了早期传统知识分子在上海寻找现实出路和精神探索的历程。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诞生和繁荣,最重要的是代表或反映了一个社会时代一个新文学形态的标志。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诸多社团流派说到底不是简单表面的实时静态空间产物,也不是单纯的文学世界的几个作家聚合式创作风格相似相近的群体现象。她是一剧变或渐变的社会时代,推涌着一群不安定的灵魂,从传统乡村的精神脐带断裂逐渐成为完全的都市人现代人的过程。”^{[37](131-137)}实际上,文人社团对上海的观照和书写,正是对其自身命运和处

境的一种审视和省思，直接昭示了他们的情感体验、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

从文学演进的角度看，旧式文人社团对上海“摩登形象”的描绘要比五四以后众多文学作家对上海的文学书写早很多。这说明中国传统文人对上海的城市化演进有着极为敏锐和深刻的洞察。换言之，是他们最早开辟了“上海”这个文学题材新领域，并将之作为文化嬗变之际的生存空间和精神载体加以描述。

因此，他们笔下的上海既是新奇的、物欲的、诱惑的，又是古老的、超然的、怡乐的，折射出现代人行为的矛盾性和精神的困惑，触及“现代化”背景下生存、生活的时代命题。这样的文学探索不仅不过时，反而对当下及后世的文学叙事、城市书写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指引人们将目光投向城市场域中人的生存状态和灵魂的悸颤。

参考文献：

- [1] 陈平原. 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 [2] 陈思和. 谈谈上海文化、海派文化和上海文学、海派文学——答《上海文化》问[J]. 上海文化, 2021(2): 14-23.
- [3] 胡思敬. 退庐全集[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0.
- [4] 陈三立. 散原精舍诗文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5] 郭国义. 听夕闲谈: 校注与资料汇编[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 [6] 诗社纪盛[N]. 申报, 1877年第1682号.
- [7] 拟开诗社[N]. 申报, 1888年第5359号.
- [8] 何宏玲. 申报与近代上海早期文人群体意识的形成——以“聚星吟社”为中心[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3): 64-71.
- [9] 王一川. 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10] 黄旦. 报纸“雅集”: 中国传统文人的城市化之始[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10-19.
- [11] 白鲁恂. 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J]. 二十一世纪, 1992(9): 18-20.
- [12] 张敏. 晚清上海租界文人职业生活[C]// 马长林. 租界里的上海.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 [13] 南江涛. 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 第三册[C]//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 [14] 周秋寅, 耿剑. 专门画家和画家专门[C]// 俞剑华美术史论集.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9.
- [15] 顾炳权. 上海洋场竹枝词[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8.
- [16] 王韬. 漫游随录[M]. 陈尚凡, 任光亮, 校点.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 [17] 文廷式. 文廷式集(增订本)[M]. 汪叔子, 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 [18] 郭嵩焘. 郭嵩焘诗文集: 卷十一[M]. 杨坚, 编. 长沙: 岳麓书社, 1984.
- [19] 南江涛. 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 第七册[C]//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 [20] 南江涛. 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 第六册[C]//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 [21] 李欧梵, 季进. 现代性的中国面孔: 李欧梵 季进对话录[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1.
- [22] 南江涛. 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 第十册[C]//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 [23] 刘豁公. 上海竹枝词[M]. 上海: 雕龙出版部, 1925.
- [24] 黄遵宪. 人境庐诗草笺注: 上[M]. 钱钟联, 笺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25] 黄遵宪. 黄遵宪集: 下[M]. 吴振清, 徐勇, 王家祥, 编校.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 [26] 左东岭. 文人心态研究的文献使用与意义阐发[J]. 南开学报, 2006(5): 45-47.
- [27] 蒋寅. 镜与灯: 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4.
- [28] 王韬. 王韬诗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 [29] 樊增祥. 樊樊山诗集: 下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30] 陈三立. 散原精舍诗文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31] 瞿鸿禨. 瞿鸿禨集[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 [32] 南江涛. 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 第一册[C]//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 [33] 王韬. 弢园尺牍[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34] 夏承焘. 天风阁学词日记: 第二卷[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7.
- [35] 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 [36] 曾娟. 接受、尝试与焦虑: 民国后期旧式文人心态探析[J]. 中国文学研究, 2018(3): 126-132.
- [37] 杨洪承. “公共空间”与文学社群关系——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的再思考[J]. 文学评论, 2011(6): 131-137.

Literati association and modern Shanghai writing of old-style poem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YUAN Zhic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Hunan City University, Yiyang 413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anghai, as the most famous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in modern times, gathered various cultural forms and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old-style literati. The newspapers and media created unprecedented conditions for their sing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free chanting, free expression, and the conscious communication consciousness of the literati community were fully realized. So, Shanghai, as a specialized theme of literary creation, received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The literati community, by describing new things and new trends, highlighted Shanghai's civilization, fashion and modernity, and by resorting to the chants of Shanghai's local historical relics and concrete objects, outlined its inclusive image.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reviewed and reflected on the dark side of Shanghai. The Shanghai in their works was not only novel, materialistic, and seductive, but also ancient, detached, and pleasant, reflecting the contradictory nature and spiritual confusion of modern people, and touching the proposition of the times of the existence and life in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Shanghai;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terati association; modern writing

[编辑: 胡兴华]